

忆红一军团宣传队

□潘振武

（作者简介：潘振武，出生于1907年，湖南常德人。文中身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文化娱乐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武汉军区副政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逝世。）

我常常想起红一军团的宣传队，尤其是在建军节。

当时，宣传队员都是从连队挑选来的年轻活泼、口齿伶俐、政治工作开展较快的班长和战士。可是多数人没念过几天书，就连教歌子、写标语、召集群众大会、布置列宁室（俱乐部），都是边学边做。由于我们同战士们一起生活，同享胜利的喜悦，同受艰苦的锻炼，熟悉战士的思想感情和语言，因此，我们的宣传活动就为大家所喜闻乐见，成为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

活跃在根据地军民中间

列宁室，这是宣传队员在连队的重要工作场地。部队只要在一个村子驻三天以上，总是首先找两间好房子，由宣传队员协助连队指导员把列宁室布置起来；操课之余，就在这里唱歌、排戏、跳舞、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进行各种有益的文娱活动。特别是教歌子，我们教战士，战士再去教驻地群众，一传十，十传百，党的政策和鼓动口

号，便通过歌唱很快地传到每个人的心里。远道来找部队的同志，只要站在村口听一听有没有歌声，就可以判断出村里有没有部队驻扎。

排练的节目够一次演出用了，就开一个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军民联欢晚会。

那是什么样的晚会呀：顺山坡架起几根竹竿子，用几块门板搭上一个简单的台子，挂上幕布，就算是舞台。要演歌剧了，一套锣鼓，一把二胡，就是伴奏的乐器。心灵手巧的宣传队员用细竹条做镜框，用墨涂黑，糊上一层玻璃纸，眼镜就成了。再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就扮成了反动头子或者帝国主义者。开晚会嘛，总得有灯光啊！我们从山上砍些松油柴，劈得细细的，借群众捉鲢鱼的铁罩子，把它架起来，往横竿上一挂，灯光就配成了。美中不足的是，这种照明灯有黑烟，开完晚会再看看，每个演员都熏成了黑鼻孔、黑眼角。

物质条件虽然那样困难，可是，演出却不间断，而且受到部队和群众的喜爱。当观众们看到高兴的地方哈哈大笑，看到难过的地方低头流泪或是愤怒地边看边骂那些白匪地主时，我们就知道剧情已深深打动了观众，获得了宣传效果，这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啊！

随部队挺进游击区

部队出发前，宣传队员就把油印的传单（有时也印些铅印的）装满小挎包，小铁桶里是写墙头标语用的白灰、黑烟子、红土（有时也弄到一点彩色颜料），还带上自造的大笔——棕麻刷子，算来要比别人多几斤重量。

随部队行动的宣传队员，还要给战士们的背包上挂个识字牌。战士们一个跟一个地望着前面的识字牌，脑子里想着，手指头比画着，边走边学。路上一休息，宣传队员就到处挑战、拉歌子、讲笑话、猜谜语。这样行军，谁还会感到疲劳呢！

做鼓动工作的宣传队员，总是在行军队伍里前后串。队伍一上山，就会看见他们在路旁插着小红旗，呱呱呱呱地打竹板，嘴里唱着：“翻山顶，看本领，比比哪个是英雄……”队伍走过去，他们拔下红旗又往前赶，到另一个山坡上等队伍去了。

任务最重的要算是跟随后哨部队走的宣传队员了。一到休息站，先选个小空场，找个光滑一点的墙壁，把红旗插在墙头上，然后调好颜色，开始写标语、画漫画。游击区的群众没见过红军，被国民党、地主的谣言吓得躲进田野里或是山岭上，山村里静悄悄空无一人。宣传队员敲敲小锣，跑散的群众回来几个，宣传队员就抓紧宣传。他们眼看红军纪律好、态度和蔼，再听了宣传队员的讲话，四下一喊，群众就一个跟一个地全回来了。宣传队员便趁机召开个群众大会，发传单，讲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释红军为什么人打仗，打的又是什么人……群众听了这些，就给大队红军准备吃的喝的。等大队红军一到，卖茶水的，卖点心的，卖鸡蛋的，早在路旁等着啦。

在战场上

每次反“围剿”的胜利，我们宣传队员也都付出相当的劳动甚至鲜血。

战斗还没有打响，宣传队员就协助政治工作干部把敌情告诉部队，帮助战士认识胜利

条件和困难，鼓动战士们进行缴枪、捉俘虏比赛……战士们的战斗劲头总是鼓得足足的。粮食和担架，也都是宣传队员动员群众准备好了的。

当战斗在山地或村庄里打响了的时候，身体好些的宣传队员就出现在战斗的最前线。他们冒着弹雨，擎着硬纸壳做成的喊话筒，用洪亮的声音向敌人喊话：“白军兄弟，不要给反动军官、地主、资本家卖命！”“穷人不打穷人，欢迎你们过来当红军！”“过来吧，我们官兵平等！”每次喊话总是招来白匪军官的子弹，可是白军士兵的子弹就往天上打，还有的干脆拖枪跑过来。当部队有了伤亡，宣传队员率领的担架队就上来救护，担架队跟宣传队员学会了隐蔽、跳跃前进和爬行，把负伤的同志安全地撤下战场。

常常在战斗进行中就押下来成批俘虏。战斗一结束，俘虏兵就更多了。收容俘虏、争取俘虏，这又是宣传队员的工作。在照顾俘虏吃饭、喝水、休息的时候，宣传队员就向白军了解哪些当官的打骂士兵最残暴、剥削士兵最苛刻……从家仇谈到国仇。这样，经过三五天的争取教育，年轻力壮、阶级觉悟较高的俘虏自动报名参加红军；老的弱的放回去扩大宣传。还有的作为派遣人员到白军里去拉人拖枪。白军士兵一见回去的人，就偷偷问道：“是不是逃跑回来的呀？”被我们放回去的俘虏就会说：“跑个鬼，一过去就给吃好的，不打不骂，不搜腰包，那边真是官兵平等呢！”这样，就有更多的白军士兵了解了红军，有适当的机会，就偷偷地跑到红军这边来。

艰苦斗争中产生的戏剧和歌舞

以宣传队为基础，有干部和战士参加的业余战士剧社，曾创作了许多戏剧和歌舞，紧密配合了当时的斗争任务。

在当时，我们演戏的方法也灵活。1933年的春节前，李卓然同志曾编写了一个话剧《庐山之雪》，剧情是蒋介石在庐山训练了大批军官，并指挥白军围攻江西根据地。在红军英勇的打击下，围攻接二连三地被粉碎，最后像庐山上的雪，在火红的太阳照射之下，融化殆尽。李卓然同志只写了剧本大纲，情节和对话都是演员自己编的。军团的首长都参加了演出，罗瑞卿同志当导演，聂荣臻同志、罗荣桓同志都扮演了角色。“将演将”“兵演兵”，台上台下满场欢呼，热闹极了。后来我们又排演了一个《杀上庐山》。

当时的剧目，当然还有很多，如启发农民向地主斗争的《谁给我的痛苦》，上海工人给我们编的《苏区景》，宣传抗日救国的《亡国恨》……都是很受群众和指战员欢迎的。

舞蹈，在当时也有很多花样。有自己创作的丁零舞、机器舞、儿童舞，有苏联的乌克兰舞、红军舞、海军舞，等等。至于歌曲、山歌、小调，那就更丰富了，随处都有创作，而且流传很广。

红军宣传队在以后的长征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除了组织收容队，帮助掉队的同志等活动之外，在雪山、草地等艰苦途中，也充分运用了文艺形式来进行行军鼓动，例如过草地时传开的一个小调：“六月里来天气热，黑水、芦花青稞麦；艰苦奋斗为哪个？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人人都会唱。

长征结束后，我们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过第一个新年时，开了个热热闹闹的军民联欢晚会。

（摘自2020年12月11日《解放军报》）

力量之源，加强支部建设

□曹玲娟 辛本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过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1月，在淞沪铁路旁的又一座石库门建筑广吉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20位共产党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出席大会。

从11日到22日，会议选举新的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审议通过大会宣言，修改了党章。

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确立了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组织、执行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

中共四大也是党支部建设的历史起点。中共四大第一次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开始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组织建设上来。随后，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功实现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到群众性政党的伟大跨越。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展陈中，能看到落款为“钟英”的两份通知的复印件。根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按照惯例，中共四大应于1924年召开。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钟英”的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称“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期不远”。9月15日，“钟英”又向

各地方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共四大定于当年11月开会。

“钟英”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其中8月31日这份由行楷写成的通知，来自毛泽东的亲笔签署。通知发给多少个地区，就必须用毛笔字抄写多少份。

中共四大的召开，比原计划时间推迟了两个月。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开始。但合作过程中，两党矛盾日益凸显。种种原因令中共四大召开时间一拖再拖。

“中共四大在党组织建设上有很多贡献。”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童科说，四大直接涉及党内领导人的称谓，地方各级执委的负责人称为书记，中央的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

此外，从中共四大开始，强调组织问题是我们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提出“三人可以组织支部”的要求。这些范式，一直沿用至今。

为便于吸收更多先进分子，中共四大决定简化入党程序，要求让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能“直接加入本党”。

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样的转变，意味着全新的起点。到了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中共党员人数已达到57967人。

（摘自2021年1月19日《人民日报》）

渔阳里新天地

□林小溪

从一座城，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风云，绕不开上海，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百年征程自此启航。

在这座城中，探寻孕育中国革命火种的红色原点，又绕不开渔阳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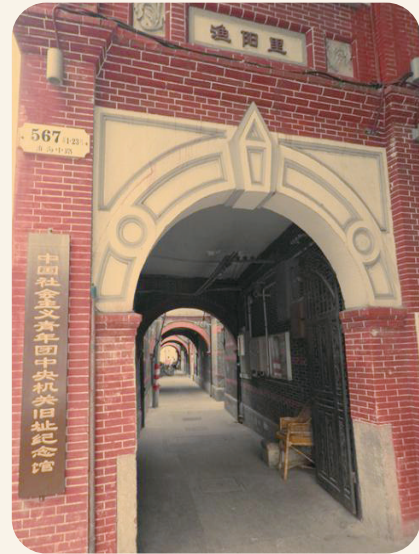
繁华热闹的淮海中路，曾经的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坐落于此，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与之毗邻。一条不宽的石库门弄堂，见证了开天辟地的历史必然：

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有共产主义色彩的青年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有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这里校对；位于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寓所，成了《新青年》编辑部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中心，也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

对于老渔阳里2号，74岁的上海市民赵文来再熟悉不过，这里是他曾住过40年的地方，其间，从五湖四海专程前来学习探访的人，多到老赵也数不清。 “要了解百年来自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民族振兴的伟大征程，必须先要知道渔阳里。”为了学习更多红色历史，老赵加入了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同参观者交流在此发生过的革命事迹。“我有幸住进了这幢意义非凡的百年老屋，也要为守护好红色历史尽一份力。”2018年，老渔阳里2号被列入革命遗址保护项目，赵文来夫妇从此迁入新宅。如今，修缮后的老房子已对外开放。

紧邻老渔阳里2号的兴业路上，同样在一幢不起眼的石库门小楼里，曾酝酿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参加一大的代表中，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19岁。与会者平均年龄28岁。



烽火28年，星星之火汇成燎原之势。石库门建筑中立下的报国之心，大浪淘沙，历久弥新。

“小时候，我常从这座饱经沧桑的石库门建筑前经过，这里的一砖一木早就印在脑海里了。”王钦庆是第一届上海红色文化创意大赛一等奖作品“初心锁”的设计者之一，上海的石库门建筑，见证了中共一大、二大、四大3次党代会的召开，也给了他诠释大赛主题“不忘初心”的灵感：参考建筑门框设计锁的外形，开锁密码设定为每次党代会召开的时间。“红色文创产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是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故事的一种有效方式。”王钦庆说，希望“初心锁”能带人们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青色砖墙、红色窗棂、红旗飘扬，一大会议址人行至此处不由心生肃穆；会址西北处，淮海路新天地商业区毗邻而居，一片时尚与繁华。

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渔阳里，正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走向“新天地”。

（摘自2021年1月19日《人民日报》）

